

引 言

知识经济离我们有多远

贾新民

—

读者面前的这套“知识经济经典汉译丛书”从翻译到出版 其间不到 4 个月的时间。这样的速度之所以成为可能，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这套丛书的参与者，仅翻译、审校人员即达数十人之多。这么多的人愿意以这样的速度工作，动机肯定不是为了趋利，也不是因个别人的组织号召能力。据我所知，人们之所以肯于如此慷慨地倾注工作热情，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能藉此契机，尽

早尽快地接触到“知识经济”这一“舶来品”的原汁原味的经典研究文献。

按理，自今年 2 月 4 日江泽民总书记作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 21 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指示，三月两会期间关于知识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谈话，五月北大百年校庆报告中，对知识经济战略地位的强调后，中国图书市场上有关知识经济的出版物已不下十数种，媒体有关知识经济的炒作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面对如此强大的知识经济信息浪潮，即使不作知识经济专门研究，单凭耳濡目染，人们对它的基本内涵也早该耳熟能详了。然而，这套有关知识经济的新书，仍能引起人们如此之高的兴致，这不能不让人有始料不及之感。

我的意思当然不在批评和贬责已经出版的知识经济出版物的质量——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推出如此之多的知识经济读物来适应知识经济应战社会动员之需，应当说，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评价，它都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奇迹。因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知识经济浪潮在中国获得如此强大的回应，从总体上讲，它极大地得益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过程，而且不仅如此，这种自上而下的过程，从中央最高当局敏锐地意识到知识经济对中国命运的战略意义起，到社会上作出广泛响应止，其间也不过几个月时间。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让此前不仅未及系统、认真研究、消化理解知识经济基本文献，甚至其中许多还根本不知道知识经济为何物的作者，写出具有学术质量的著作，显然不仅求之过苛，而且甚至不尽情理。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出版物的带动下如此迅速地完成了迎接知识经济的社会动员，应当说，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这些作者工作的最雄辩的评价。但

是，知识经济对于中国，毕竟是一件太严肃甚至是太严峻的事情了。我们民族迎接工业革命挑战的百年悲壮跌宕的历史告诉我们，迎战一个外源的社会变革压力带来的挑战，即使仅在观念上，也绝不是仅靠几本普及著作鼓动几个浪潮，从而使几个概念术语成为时尚的口号和套话就能奏效的。离开对于反映这一变革的起源、前提、内涵以及在其发源地的实践、经验、教训、反思性思考的著作的深刻研究，我们就根本无从理解它对中国发展的真正涵义，没有言说在中国迎战的基本资格，当然更惶论战略的设计与实施了。我想人们在听说珠海出版社组织出版这套译丛后，对能尽早尽快地阅读到这批知识经济的原创性文献，怀有如此急切和真诚的心情，原因大概正在于此。理解了参与或未能参与这项工作的同仁们的心情，我想本套丛书的出版意义，似乎也便没有进一步赘言的必要了。

二

该套丛书的英文版主编，为他的序言选择了一个极富力度的题目，即“为什么是知识，为什么是现在”。这一题目本身，使他的文章已不再仅仅像一套丛书的序言，而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宣言。它对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们是具有说服力的，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疑虑大概很难因此而根本消除。

“知识经济”在中国的陡然升温，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回应。尽管单从媒体上看，对这一现象几乎是喝彩声一片。但是只要身在学术界，便不难发现，持保留和怀疑态度的人并不在少数。几乎在所有与知识经济直接、间接有关的会议议论中，有

一个问题是逢会必提的，那就是知识经济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之后才被提上日程的事情，对于我们中国这个离完成工业化尚有距离的国家，是否太远了，或我们对它是否太一厢情愿，太主观了？

这一问题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毫无疑问是深刻的。特别是随着人们对我国建设初期盲目追求重工业化历史教训和东亚危机反思的深入，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起步阶段这一问题就被严肃地提出来，价值尤其重要。

它的表层含义是知识经济挑战对中国是否真实，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对中国是否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而在更深层次上，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通过结构变革推动经济增长是否有限定性、条件性和客观规定性，或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形成、产业构成升级是否与其要素禀赋、成本构成有关，它的机制、动力究竟是什么。

应当说，对上述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回答，是知识经济研究的全新课题。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能稍许详细地讨论一个问题，我想澄清某些具体问题是必要的。其中最典型的一点是，由于前一阶段舆论宣传方面的缺陷，两个不同的问题被混淆了。一个是“我们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另一个是“我们如何提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知识经济离我们多远的争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这种混淆造成的。但很明显，“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它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不是一回事。其中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具备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条件的国家，并不等于可以免受知识经济威胁的国家。一些学者强调，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在发达国家的现实化，全球经济系统将面临一次新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分工中，知识经济国家将进一

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经济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另一部分无法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虚拟国家”，本丛书《知识经济》第30页）。在20世纪，曾经极大地抑制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依附地位的“技术壁垒”，在新时代将因此而被进一步巩固和放大，缩短二者间差距的努力，将变得更加艰巨和困难。所谓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它的第一位含义显然不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工业化、信息化前提的国家——能否绕过过渡阶段而直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是在发达国家因知识经济而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战略性努力，避免国际竞争地位的进一步恶化或改变自己被动地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紧迫的。无论我们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还有多远的距离，迎接挑战则是一个不容犹豫的选择。

当然，强调发展中国家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紧迫性，并不否定其由要素禀赋决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革时序的客观规定性，不意味着否定发挥比较优势潜能的必要性。但这里的问题是，首先，影响和确定比较优势的因素是什么？它是单一的还是多因素的；其次，比较优势对于增长和发展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盲目追求通过工业化努力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构趋同的深刻教训，使得许多情况下，人们对通过结构变革带动经济增长的非均衡路径，保持着一种过于敏感的心态。但是，只要人们能够在关注要素成本对比较优势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也同等地关注钱纳里等人揭示的由过分拘泥于要素价格而

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不能自拔的国家的教训，上述理解和心态的片面性，便会一目了然……低价格要素的存在，确实为形成比较优势、进而形成低成本增长提供了可能。但是，它显然不是唯一的。静态地看，一种低成本要素是否具有现实的比较优势，最终起作用的是它的边际收益。只有当同等收益利用该要素的成本低于利用其他要素时，该要素的比较优势地位才具有现实性。动态地看，任何一种产业、一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是变化的。只要关注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准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便会发现，比较优势的一个更深刻和更本质的功能，是为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地生产制约其结构变革的稀缺要素，从而弱化稀缺要素对发展中国家选择非均衡增长战略的约束强度，将国民经济推向主要依靠结构变革实现增长的内涵化路径。显然，不顾要素禀赋对结构选择的规定性，人为地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知识经济要求趋同，我们必然要重犯五六十年代盲目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错误；相反，无视比较优势对产业结构变革的更为积极的潜能，我们不仅会使国民经济国际竞争能力退化，而且会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把上述的简要分析归结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出发，在比较优势与结构变革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从而赋予国民经济持续而经济地增长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是否从增长理念上能够突破新古典主义的禁锢。

我国五六十年代重工业主导的国民经济增长模式问题也是同样的，它的教训的深刻性，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构与要素禀赋间的简单平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结构变革预期与稀缺要素生产能力背离、从而使国民经济失去比较优势支持的问题。它

同时包含了一个在制度性低全要素生产率及由此决定的要素生产率条件下，国民经济结构变革过分依赖以廉价劳动为特征的“比较优势”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决策当局才可能通过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人口流动的抑制机制，人为地抑制传统产业中劳动资本边际替代弹性。避免农业发展对资本需求的扩大和剩余劳动力的排斥，人为地掩饰资金等要素的稀缺性及高成本，从而人为地压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努力的成本，用人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推动国民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的提升。改革开放后迅猛出现的自发的农村工业化浪潮、民工潮雄辩地证明了传统产业、及被传统产业容纳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早已丧失。总结我们的教训，除应看到其产业结构的高资金密集要求远远超出了中国要素禀赋的供给能力外，同样应当看到，为了维持用劳动替代资本的比较优势而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造成的严重后果。它说明，发展中国家一旦完成了经济启动，要素成本就会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日本学者提出的依据“收入需求弹性”变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钱纳里等人提出的结构主义的“非均衡增长路径”，正是由于正视了发展中国家这一特征，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摆脱了新古典主义僵化被动的模式，而为发展中国家开辟出了一条依靠结构持续变革推动增长的广阔路径。

以上，我们要说明的是，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路径、对产业结构变革的规定性含义的丰富性，特别强调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和产业结构变革对维持比较优势的价值。它证明发展中国家迎接知识经济挑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尽管程度不同，但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不

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比较优势，进而与知识的距离存在很大差异。这一事实，为我国在不过分放大区域差距的前提下，对知识经济作出梯度响应提供了可能。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一方面充分利用知识经济提供的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大幅度缩短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最逼近知识经济的前沿领域、地区、部门，深化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大兴科教、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程度，力争通过知识经济时代的迎战努力，为我国在新世纪的全球化经济竞争中创造更加主动和有利的条件。

三

很多看过这套丛书译稿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概括起来，就是新鲜、新奇与陌生，而且，在前一阶段对国内作者写作的文章读得越多的人，这种感受越强烈。究其原因，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前一阶段的出版物中，许多作者介绍知识经济的文字，实际上没有超出科教兴国的范围，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是，我在此前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科学技术的作用，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被人们自觉意识和强调的主题。尤其是到了本世纪后半叶，这一点几乎成了世界性的共识。如果说知识的含义仅限于此，那么，它不过是 20 世纪后半叶趋势在新世纪中的延续，而没有多少值得兴师动众的新意。而读过这批文献，人们便会发现，许多中国作者心目中的知识经济问题，不过是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地位的问题。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没有逼近知识经济变革所涉及的

内涵。

不错，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最直观和最基本的特征即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地位的空前提高。但是，它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中对知识地位认可的最实质差异在于，在这一时代，知识不仅不再是资本生产的附庸，而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的处理、传输成本和效率也不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曾经被信息传输效率低下掩饰的知识本身的稀缺性及知识生产能力，成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强制约的瓶颈；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知识需求才成为人类实现其他一切预期的前提，知识生产本身才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不仅社会经济组织形态、社会生活结构方式，而且包括人的价值原则，甚至仅仅适应工业文明要求的知识观本身，都要围绕最有利于知识生产潜力的开掘——人的创新能力的最大限度发挥而进行空前和深刻的改造。知识经济之所以是一个继工业文明即以资本生产为中心的时代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变革，其最核心的部分正在于此。在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将要发生怎样的变革、教育将要发生怎样的变革、企业将要发生怎样的变革、组织、管理理念将要发生怎样的变革，进而关于什么才是知识的知识观将要发生怎样的变革，以及所有这一切变革，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玫瑰色的，还是玫瑰树掩饰下的阴影。它之所以极富挑战性，不仅是指实现知识经济过程中，还指我们进入这一时代以后。

这套译丛，目前出版的有四种，即《知识经济》、《知识的进化》、《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第五代管理》。其中两部即《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是由一批凭借个人的睿智和历史敏感性洞察到知识经济破晓曙光的作者们的经典文献

构成的文集。从中，读者在把握知识经济现象逻辑构架的同时，也可以清晰地透视到这一文明现象被揭示的历史脉络。相比较而言，《知识经济》展示的是一幅更为宏观的逻辑与历史画图，更像是这套丛书的导论。而《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则更多地收集了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们对知识经济时代经营行为、管理行为的更实证的微观研究，或管理实务指南。

文集之外的两部著作是颇富盛名的管理学权威的个人著作。一部是《知识的进化》，单从书名看，它像一部导引人们适应知识时代变革的对知识本身进行历史和哲学反思的作品，但本质上，该书是一部具有很强实证性的实务管理指向极强的著作。与一般的管理著作的不同之处，或从与书名一致性的角度阅读，我们当然也会同时发现该书作者确实不乏哲学睿智，特别是对有关组织现象知识分析，对传统知识观反思的深度要超过许多专门哲学著作，她避免了自己著作的哲学思辨风格，结果收到了反思与务实双重功能的成效。

中国读者对《第五代管理》不应陌生。国内曾译介过该书。但这里选人的是作者刚刚修改完毕的全新版本，修改不是文字性的，也不是章节性的，而是理念性的。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作者以小说家的文采和风格，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处在知识经济门槛上的企业管理者们发现传统管理理念的弊端，以及捕捉到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哲学的全过程，而且还生动地展示了弃旧图新过程中的一代跨时代管理专家们的焦虑、彷徨、挣扎，以及最终毅然走向新时代的心路历程，它不仅使第五代管理理念因此而变得形象、直观和通俗，而且使同样处境下的人们由此感受到一种同情、亲切；它使管理理念变革，因此而减少了来自心理抵触造成的阻力。该书的第二部分，作者以第一部分的铺垫

为基础，理性地阐释了作者对知识经济下经营行为特征及适应这一特征的新哲学的理解。该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在海外市场热销程度是人所共知的。它的读者不仅超出了管理学家、教授、学者，甚至超出了企业经理阶层，成为更普遍的社会成员形象地理解知识经济的一门导读性著作。

把这样的四种书选人我们的译丛，特别是在当前，我相信对校正人们对知识经济现象的误解，导引人们以此为基础，深化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许多朋友在此期间也曾向我推荐过其他一些著作。据我所知，他们所推荐的这些书的权威性并不一定更低，但是，任何一套目的有限的丛书，它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希望今后能有机会通过与这些朋友们的合作，使那些暂未收入该丛书的杰出的作品能以中文形式面世。而眼前，我能做的，只是向这些热心而富于责任感的同仁表示谢忱与歉意。

四

知识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现象，涉及的学科领域极宽，这给我们的翻译、审校工作带来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能说的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留下的力所不及的缺憾，我们只能等待该丛书面世之后，通过朋友们的批评切磋来校正了。

本套丛书的全部工作，都是在酷暑中完成的。约定了的工作周期无情地剥夺了所有参与者避暑消闲的权利。在整个过程中，我知道自己扮演的的是一个冷酷而刻板的类似工头的角色，明知所有的参与者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潜力用到了极限，而我

能说的仍然只是工期，工期，工期！今天，这个令人恼怒也令我自己厌恶的角色总算演完了，我相信对这些为此付出艰辛的朋友道歉不仅多余，而且虚伪。在还散发着油墨新香的一套新书面前，因曾为此付出劳动而油然升起的喜悦与成就感，会给们带来慰藉，而那时的慰藉肯定会超过所有能用来表达谢意的语言。

在本套丛书审校工作的最后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教授金吾仑先生，我的朋友——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田铭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农两位副教授义务地承担了大量关键性校译工作，他们拒绝收取报酬，拒绝署名，使我不知如何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之情。我相信这套书的顺利出版，会使他们感到慰藉和喜悦。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总 序

为什么是知识？ 为什么是现在？

劳伦斯·普鲁萨柯

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热衷于知识的高潮？在 1996 年，至少将举办 6 个有关这一主题的重要研讨会，有计划增加 3 份聚焦于知识（有时泛称智力资本或组织学习）的新刊物，许多在美国和（较为缓慢地在）欧洲的重要公司，正在增加诸如首席知识官员或组织学习等岗位，甚至还有少数智力资本副总裁！

所有这一切为何会集中到一个主题，即自前苏格拉底式哲学家们以来，某种程度上到处存在的主题？这又是一项似乎来去匆匆，

犹如一些经常性的随意自然现象般的巨大管理热？我们不认为如此！我们中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许多人都目睹了许多不同灵丹妙药的盛衰，所有这些灵丹妙药都企图向企业提供赢得稳定竞争优势的新路子。然而，当许多呐喊失败时，我们已经得出结论，除非垄断政策和其他不正当市场行为，不存在稳定的优势，但一家公司懂得它能利用它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它现在能多快的了解一切情况，则不然。

然而，这仍然未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知识，为什么是现在？让我们尝试列出一些主要趋势，这些趋势在推动知识潮流中似乎扮演重要角色。

A) 经济全球化，这在增加适应性，创新和处理速度方面，正在向企业施加可怕的压力。

B) 专门知识的价值被认识，它已被融入组织程序和日常工作中，以应付上述压力。

C) 知识作为独特生产要素被认识，它的作用使具有工业知识的书籍增加了市场份额。

D) 廉价的计算机网络化，这将最终提供我们相互工作和学习的工具。

正当许多人可能会为赞成或反对这些趋势而辩论时，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组织和社会生活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脑逐渐取代肌肉。然而，我们几乎没有延误使用概念性工具，以使用“原始物”(Wetware)改进工作。

正是带着这些理念的力量，我们向你们奉上这套书。到目前为止，几乎不存在约定标准和逻辑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定义，但同时又有足够的系列文章和书籍，帮助管理者在处理紧要而又捉摸不定的知识主题时，获得一些实际的支持。

我们考虑其他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毕竟已近 500 年，让这些著作启动知识的过程，使我们在 21 世纪改进管理。

导 言

知 识 经 济

达尔·尼夫

在过去几个月，隔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听到和看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这一用语。它是一句政治斗争的口号？还是通俗商业周刊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在美国商业圈里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其含意却大相径庭。这一用语被狂热地用于描述新的相互联系的经济和在工作场所、家庭内新实现的技术的正面效果。同样，它也被用于哀叹劳动力中蓝领部分缩小的效果。对于一些人来说，“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描述了计算机化和高技术电子产业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NP）贡献的比例在不断增长。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知识管

理”(knowledge management)背后的原动力。“知识管理”是传统组织结构为更好地顺应高技能的“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所做的适应性改变,这些知识劳动者工作在性能优良的工作场所,提供着解决复杂问题的服务。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用语,既用于描述正在到来的全球繁荣的时代,也用于描述正在到来的经济前景。

那么,什么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真的是新颖的或独特的吗?它的效果是什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了帮助回答这些问题,弄清学者和经济学家所说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恩永公司(Ernst & Young)商业创新中心的支持下,我们编辑了这本书,为商界和公共政策领域想知道这些问题的人提供一些答案。本书收集了论述这一领域最重要主题的文章:计算技术、电信、全球化和相互联系的经济;就业从体力(brawn)向脑力(brains)转移;由在新的高性能工作场所工作的新型知识劳动者所带来的组织变化;“知识精英”(knowledge elitism)对涉及教育和培训、财富不均和社会排外的公共政策可能施加的影响。本书的意图是作为一本入门书,通过引用各种不同出处的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引导读者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所有方面。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兴起背后的基本论点是,在过去的五年间,曾经存在着集中的市场激励(focused market incentives)的奇特结合,导致了计算技术、生物技术、电子通讯和运输(仅举这几个例子)领域巨大的技术进步,并已开始孕育经济组织和政府按未来将要据以行使其职能的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的确,有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高技术和高技能服务以及由它们创造的新的产品和服务结构里的突然的和不可